

陈履生：我与《美术报》

■陈履生



2014年9月6日《美术报》
《陈履生微言》第一篇

媒体与艺术家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媒体与艺术发展的关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从现状来看，媒体之于艺术，是一种水和鱼的关系。水至清则无鱼，这是一般的道理，所以，当代媒体在社会的影响下，要想达到“至清”的境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媒体人还是不懈地为这个行业的相对清纯而努力，为这个行业所服务的艺术事业而不断地添薪续火。尽管我们的艺术媒体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是，它对艺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还是有目共睹。

今天，与艺术相关的媒体已是不计其数，这是今日艺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之中主流的与非主流的，中央的与地方的，大陆的与台港澳的，合法的与非法的，国营的与公私合营的或完全是私营的，林林总总，各式各样。对于媒体的评价，基于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结论，专家和公众的差异属于情理之中。专家的意见固然重要，可是，公众的看法也不容忽视，因为发行量这一基本的衡量指标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媒体与公众的关系，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编辑反映公众需求的努

力。不管是读者，还是作者，在这个不断选择的社会中选择媒体的标准，基本上是看媒体的影响力和与自己的关系。媒体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是靠一点一滴所累积的，20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20年中有无数的作者和读者的选择，有进有退，而关系也是有紧有松，相信有过交道的人或填写过征订单的人都能说出一些不同的或相似的体会和认知。

2004年初，我接受了《美术报》撰写专栏的邀请，在《美术报》开设了“陈履生观点”专栏。当时，我在《文艺报》和另一国家级的报纸撰写专栏，而对《美术报》了解甚少，只是知道杭州有一张《美术报》而已，之所以应承，是因为它的大众性以及我所感觉到的它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以我在国家级出版社从事美术编辑工作17年的经验，深知地方出版社的真正实力以及在美术界的影响，所以，我不在乎中央和地方的差异。因为远在兰州的《读者文摘》的成功，已经说明了编辑的专业水准与独特的眼光决定了这一事业的成败，而读者的选择首先是看内容，而不是看出版单位的牌子。因此，我乐意在一个没有“中国”字头的地方报纸上开辟一个新的阵地。不久，我与《美术报》的领导和编辑已经磨合得可以，所以，我又作出了另外的选择：因为我在《文艺报》的专栏已持续多年，决定见好就收；另一家报纸总是要限制选题和修改稿件，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写，使我感到非常之不爽，三下两下就烦了，自然收兵。这样我就固守在《美术报》这一个

阵地上。转眼就到了2011年，在我调任国家博物馆之后实在无力再进行这样每周必须坚持的观察、思考与写作，终于在2月的第二周之后结束了这个专栏。前后历时七年加一个半月，总共写了370余篇，已经出版了《偏锋用笔》、《随类赋彩》两本文集，还有一本正在编辑之中。

《美术报》从领导到编辑给我充分的信任，相信我在各方面的把握能力，使我不仅享受到文责自负的喜悦，而且应有的自尊也得到了满足。作为编辑，我不愿意修改别人的稿件，因为我同时身为作者，自知从思想内容到遣词造句中的反复推敲，经历了冥思苦想和抓耳挠腮，所以，我不喜欢别人修改我的稿件。《美术报》编辑的编辑作风正合我意。

当代美术界这潭水深浅莫测，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即使是严肃的学术的问题有时也会扯上各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因此，作为一个以观察和批评美术时事的专栏，要想绕开、躲避，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不写这个专栏。因此，七年多来的专栏文章中批评过许多人和事，也触动过体制内的许多问题，确实是得罪了人——尤其是得罪了体制内的某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同时，也惹怒了体制外的一些以“艺术”的名义行假恶丑的人。受到连累的是报社的领导和编辑，如果没有他们宽容与理解、默契与坚守，能够坚持四年多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美术报》能够不避风险地去触摸时事，不仅形成了《美术报》的特色，也在读者中树立了它独特的公众形象。作为一个公共媒

体，如果不能反映读者的需求，不能参与到当代美术的社会现实之中，那么，不仅没有存在的必要，也必然会失去公众的支持。

尊重学术是专业媒体的立根之本，《美术报》立足于学术的现实批评是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疑，它也会带来读者对他的批评。如何包容不同的批评既体现学术民主，又表现学术风度。我是不断向报社领导和编辑提出批评的读者之一。其中有一些画家自我吹嘘的标题以及一些不合适的内容，我会在第一时间提出看法和意见，报社的领导和编辑都能够以共同探讨的心态来对待或接受我的批评，这也是令我感到亲切的。当然，报社对待其他读者的批评也是如此。读者是《美术报》的衣食父母，《美术报》在尊重学术的同时尊重读者，这是它成功的重要经验。

作为一位作者，能够得到一块有限的版面，持续不断地发表自己对当下艺术现实的看法，应该说是幸运的。尽管自有其辛苦之处，可是一吐为快的感觉是超于辛苦之上的。而这之中对于持久力的考验，对于自身的不断学习，也是非常难得的。虽然我是半路插队进来与《美术报》同行，见证了《美术报》20年的发展，我为《美术报》对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高兴，也为《美术报》所持有的宽容和进取的精神而欣慰。以上是我选择《美术报》、并且不离不弃的一些主要的原因。

(本文选自“陈履生美术馆”微信公众号，为陈履生依据旧文所改)



周培纳：童年的印石又回到我的手里

■本报记者 施涵予



周培纳篆刻

周培纳是西泠印社为数不多的女社员之一，她于2017年正式成为西泠印社社员。作为福建人的她，其实从小就和篆刻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能就是始于童年的游戏。”福建是中国传统“四大印章石”之一寿山石的产地，家里摆放的各类印石就是周培纳和小伙伴的童年玩具：“我们小时候会用刀刮印石的粉末，一起玩医生治病的过家家。其实在这时候，篆刻的动作已经产生了。”

很多年后，周培纳开始接触篆刻，并考入浙江大学书法专业，读至硕士，印石已经是她人生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回想起这段童年往事，她感到犹如命运的注定。学习篆刻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梦想：“这辈子如果能加入西泠印社就好了。”

两次试题，“吓”到考生

有了这个想法，周培纳便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2013年，30岁出头的周培纳第一次参加西泠印社海选，竞争之激烈令她始料未及，她形容考试简直“像在打仗”——限定的短短时间内，要刻完一方命题的印，要刻边款、拓印，还要写一件命题的书法作

品，外加现场论文。习惯了书斋式的悠游创作的周培纳，几乎是手忙脚乱地完成了考试，结果是遗憾落选。

经历了这次考试，她对西泠印社对社员的高标准有了具体直接的认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既要精通书法篆刻，还要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朝着心目中的这座“圣殿”不断前进。在学习创作中，她比较喜欢写意和雄强一路的风格，在古玺上相对用功较多，古玺不假修饰意趣横生的风格面貌是她心之所向。

四年后，她再次进入西泠印社选拔社员的总决赛，这次的考试题目又吓了她一跳——刻印的内容，正是“西泠印社”这四个字。一时间，无数大师的作品都涌上她的心头。尽管前贤的刻印让人印象深刻，她摒除杂念、全神贯注，以自己的风格刻下了这四个字。

“每一个印人心中可能都揣着一个理想：我有生之年一定要为自己刻一方‘西泠印社中人’的印。我觉得我现在还不敢刻。但在那次考试，我居然提前实现了这个愿望。”而她也在那年成功入选，成为了真正的西泠印社社员。这是她在人生第三个本命年收获的最大惊喜。



做好普及工作，
让篆刻走进寻常百姓家

入社后，周培纳不仅在个人的艺术追求上不断进步，她也发现，印社的发展还要靠坚持守正创新。西泠印社在继承发展金石篆刻的同时，也在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承深沉的家国情怀，这样的品质影响着所有社员。

这些年，她做了很多篆刻书法的基础普及工作，包括教材编写、课程录制等，并且积极利用互联网开展宣传。她觉得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方面要继续往高端、极致的艺术创作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扎根到更广泛的人群当中，让小众艺术也能走向寻常百姓家。

“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她)原本不太了解篆刻，但在接触的过程中，慢慢认识了篆刻，进而喜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是喜欢上文字学。”周培纳希望通过普及工作，可以在人们心中播下小小的种子，从小印章中见到大气象，更深刻地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如同儿时不经意的游戏，在未来的岁月里生长出更丰茂的枝叶。